



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研究文库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敦煌吐鲁番研究 文献与文明

刘再聪 秦丙坤◇主编



西北民族大学出版社
敦煌学文献丛刊



中国现代学人与学术

敦煌吐蕃研究 文雅与文明

王仲闻 著





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研究文库
■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

敦煌吐鲁番研究

文献与文明

刘再聪 秦丙坤◇主编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吐鲁番研究：文献与文明 / 刘再聪，秦丙坤主编.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3.10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ISBN 978-7-5490-0500-0

I. ①敦… II. ①刘… ②秦… III. ①敦煌学—文集
②出土文物—文献—吐鲁番地区—文集 IV.
①K87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9786 号

敦煌吐鲁番研究：文献与文明

刘再聪 秦丙坤 主编

责任编辑：原彦平

封面设计：苏金虎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http://www.gswhenhua.cn>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 编：730030

印 刷：兰州万易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黄河北玉垒关 23 号

邮 编：730000

开 本：787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280 千

印 张：18.25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490-0500-0

定 价：45.00 元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田 澍

副主任：刘再聪 何玉红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辉 伏俊琰 李并成 李迎春 李建国

李晓英 李家莉 沙武田 尚季芳 张 兵

张 嵘 张德芳 杨惠福 杨鹏飞 俄 军

胡小鹏 秦丙坤 黄兆宏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由

甘肃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甘肃文化发展研究院、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考古学、中国史、民族学、世界史重点学科

资助出版

前 言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长期稳定和最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学术积淀深厚。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西北疆域演变与国家稳定、西北边疆环境变迁、西北边疆民族宗教问题、西北边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近年来，西北师范大学充分利用便利的地域优势，主动适应地方文化建设的需要，在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开展系列学术科研活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一、编撰专题学术著作。以西北边疆史地为主题的学术专著有五十多部，其中主要有：吴廷桢、郭厚安《河西开发史研究》，季成家等《丝绸之路文化大辞典》，赵向群《五凉史探》，陈守忠《河陇史地考述》，侯丕勋、刘再聪《西北边疆历史地理概论》，李清凌《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实践》，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研究》，田澍《西北开发史研究》，田澍、何玉红《西北边疆社会研究》，田澍、何玉红《西北边疆管理模式演变与社会控制研究》，田澍、陈尚敏《西北史籍要目提要》，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胡小鹏《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李建国《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尚季芳《民国时期甘肃毒品危害与禁毒研究》等。这些学术著作或以主题探讨为主，或以资料汇集为主，内容系统、全面，且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二、承担各类科研项目。以西北边疆史地为主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等八十余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王三北《中国历代西北开发思维和苏联对外政策》，赵汝清《丝绸之路西段历史研究》，李清凌《元明清三代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研究》，田澍《明清中央政府与蒙藏民族地区政治互动策略研究》和《十四到十六世纪明蒙关系的走向研究》，刘再聪《唐

朝“村”制及西北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研究》和《唐朝“村”聚落形态与基层行政制度“西进化”历程研究》，李并成《历史时期我国西北地区沙尘暴研究》，李晓英《近代甘宁青回族商人研究》，连菊霞《宗教信仰与族际通婚——以甘肃积石山县保安族、回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例》，尚季芳《近现代西北民族地区毒品问题与社会控制研究（1840—1960）》，胡小鹏《晚清至民国时期甘青藏区社会群体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潘春辉《清至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农村用水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李建国《近代西北地区商贸经济及对当地社会发展影响问题研究》，王新春《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与近代中国西北考古研究》，张嵘《我国社会现代化历程中的少数民族发展研究》，刘清玄《天水麦积山石窟洞窟题记释录与研究》，张荣《哈萨克问题与清代西北边疆安全》，李永平《甘肃新出土魏晋十六国文献整理研究》等。这些项目围绕与西北边疆史地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内容展开研讨，主题集中，针对性强。

三、召开系列学术论坛。以西北边疆史地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有：“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暨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史研讨会”，“庆贺蔡美彪先生八十华诞暨元代民族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第11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文化学术研讨会”，“河洮岷历史文化与甘肃民族史学术研讨会”，“南梁精神与甘肃红色文化高层论坛”，“甘肃历史文化资源高层论坛”，“甘肃远古文化与华夏文明高层论坛”，“中国古代史教学改革高层论坛”等。这些论坛吸纳国内外知名专家就当今西部大开发、西北边疆安全、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西北生态保护、西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等前沿课题展开集中研讨，提供学术咨询，具有较强的服务社会与政策咨询功能。

四、加强机构和学科建设。西北师范大学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学科的发展。2010年5月，西北师范大学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获批为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国内专门从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高水平科研平台。目前，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互为依托的科研平台有中国史一级博士点、中国史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甘肃文化发展研究院、甘肃省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等。互为依托的平台之间相互推进，同步发

展。2006年以来,《敦煌学教程》、《简牍学教程》、《西北边疆考古教程》、《西北少数民族史教程》等8部本科生系列教材先后出版,在国内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方面产生了良好的影响。2013年,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民族学四个学科同时获批为省级重点学科,使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建设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五、重视持续发展。近年来,西北师范大学围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在《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内权威学术期刊和报纸上发表高水平论文学术七百余篇,不少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截止2009年,汇聚阶段性成果的学术丛书《西北史研究丛书》十册本最后出齐。为了使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能够获得进一步、持续性顺利发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应运而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的编撰,必将不断深化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度,拓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视野。

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必将得到持续发展的事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目 录

《沙州都督府图经》纂修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

..... 朱悦梅	李并成 (1)
《河西节度使判集》(P.2924) 有关问题考	李并成 (11)
P.2979 《唐开元廿四年岐州郿县县尉牒判集》研究	潘春辉 (18)
敦煌写本吐蕃文雇工契P.T.1279 ₄ 探析	李并成 侯文昌 (34)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之唐代三件文书的研究	陈守忠 (47)
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床”的探讨	黄兆宏 (64)
有关王玄策事迹的一条新史料	李并成 (76)
敦煌算经九九表探析	张小虎 (79)
敦煌遗书中的民法文卷考	李并成 (88)

唐宋敦煌染料与紫服制度的被突破——以P.3644为中心

..... 刘再聪	赵玉平 (96)
从敦煌文书看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布纺织业	金滢坤 (111)
从P.2942文书看河西陷蕃前后变通运用律令的问题	僧海霞 (126)
唐前期敦煌农业开发述略——以P.2005 《沙州都督府	
图经》为中心	潘春辉 (134)
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县以下行政建制	刘再聪 (143)
吐鲁番出土唐前期给粮帐初探	吴 超 (161)
说河西的塹——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材料为中心	刘再聪 (174)
从甘博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看唐、宋洗儿风俗	
..... 胡发强	刘再聪 (191)
莫高窟第23窟“雨中耕作图”新探——兼论唐宋之际	
袄教文化形态的蜕变	邵明杰 赵玉平 (200)

莫高窟第196窟“甘州(菩)萨保”题记新考	邵明杰 (214)
敦煌女诗人宋家娘子及其诗篇	秦丙坤 (220)
敦煌写本二《南》校记	秦丙坤 (225)
敦煌写本《吴都赋》校释	秦丙坤 (229)
吐鲁番写本《文选》残卷及其价值	秦丙坤 (233)
《德藏吐鲁番本〈文选〉校议》商兑补校	秦丙坤 (240)
《德藏吐鲁番本〈文选〉校议》摭遗校补	秦丙坤 (248)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译者序言》	(260)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著者序言》	(262)
《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译者前言》	(265)
《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中文版序言》	(268)
《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俄文版第一册序言》	(272)
《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俄文版第二册序言》	(279)
后记	(282)

《沙州都督府图经》纂修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

朱悦梅 李并成

我国中古时代三或五年一造的图经资料，是随着自然地理风貌的变迁和社会历史事件的发生不断补入的，无疑有利于我们考察某些历史事实的演进过程。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沙州都督府图经》(以下简称《图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唐代图经之一，对于中古时代的历史、社会、地理、中西交通、宗教等方面的研究和方志学的研究均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①

P.2005《图经》原件现存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首尾俱残，存510行。

《图经》被发现后，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有关《图经》的写作年代问题，罗振玉最早进行考证：“此书之作，殆在开元间。虽卷中多颂扬武后语及遇大周处多跳行、空格，而无伪周之新字，且有开元之纪年，又避唐讳，如虎作武，隆作阝，基作其，四民作四人之类，均为作于唐而非周之确证。记事至开元而止，而不及天宝以后，又为非作于肃代之后之明征也。”^②郑炳林亦引用此证。^③王重民认为“实作于武后之世”^④。日本池田温对写卷进行了系统整理研究，

① 李并成：《唐代图经蠡测——对〈沙州都督府图经〉的研究》，《敦煌学研究》(《西北师学院学报》增刊)1986年总第5期。

② 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上虞罗氏排印本，1909年；《鸣沙石室佚书》，上虞罗氏宸翰楼影印本，1913年。

③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1页。

④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13—117页。

认为图经是根据上元三年（676年）以后数十年间成形的《沙州图经》编纂，武周证圣元年（695年）大幅增补而成，开元初又有部分添插，永泰二年（766年）沙州升都督府后改称为《沙州都督府图经》。^①李正宇亦同意此观点。^②周绍良以为此卷成书于武周时代。^③王仲荦认为“《图经》纂成，当在开元四年之后”^④。此外，伯希和^⑤、饶宗颐^⑥、严耕望^⑦亦有相关的研究。

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图经》当中的断代信息重新详加拣选和分析，试就《图经》的详细编纂、添修时间做出较为细致的整理。

一、编纂的上、下限

池田温将S.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P.2005《图经》与P.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沙州地志》）放在一起进行了研究。并参考S.367《沙州伊州地志》、S.788《沙州图经》、向达所录《寿昌县地镜》、P.2691《沙州城土境》和S.5448《敦煌录》等，据《沙州地志》中出现播仙镇、石城镇及本件《图经》中出现的石城镇名称对《图经》上限做出推论。因二镇于上元二、三年（675年、676年）罢安西都护府后相继划属沙州，推断《图经》上限在上元三年。

P.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李正宇认为体例与S.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和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之纲目式志书同，且卷中内容不涉开元、天宝年代及其以后之事，又出现武周新字‘爾’（初），而

① 池田温：《沙州图经考略》，《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第55—101页。

②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1页。

③ 周绍良：《读〈沙州图经〉卷子》，《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

④ 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⑤ P. Pelliot.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 Ouvee au Kan-sou [J] BEFEO VIII, 1908. PP. 519—620.

⑥ 饶宗颐：《敦煌书法丛刊》第十二卷《经史（十）》，《解说》，东京：二玄社，1984年，第2005页。

⑦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又不避“基”字，可能为武周时旧本。因而支持池田温对其作《沙州图经卷第五》的定名，以之为《沙州图经》的一部分。^①而笔者认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将之定名为《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②应该是较为妥帖的。另外，也有学者认为P.5034与S.2005和P.2695是否同为一个底本，尚无法确定。^③

S.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第3行：“沙州下。属凉州都督府管。”《旧唐书·地理志》：“武德二年（619年），平李轨，置凉州总管府，管凉、甘、瓜、肃四州……七年（624年），改为都督府，督凉、肃、甘、沙、瓜、伊、芳、文八州……咸亨元年（670年），为大都督府，督凉、甘、肃、伊、瓜、沙、雄七州。上元二年（675年），为中都督府。”^④同书：“沙州下。隋燉煌郡。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为西沙州。贞观七年，去西字。”^⑤郑炳林据之认为该卷所称凉州都督府当在武德七年至咸亨元年之间，而写卷则应著于唐贞观年间。^⑥而沙州升都督府的时间，据《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陇右道“沙州永徽二年（651）五月升”^⑦。如果《沙州图经卷第一》的下限可以断定在沙州升都督府的永徽二年之前，且池田温所说《图经》是据《沙州图经卷第一》增补而成的观点亦不误的话，那么，《图经》的上限大概在永徽二年以后似更合理。因唐代初期，政治制度稳定，律令格式规范，故图经的修纂亦当有条不紊。随着沙州行政级别的上升，图经的名称只是在续修过程中适时地变更。

沙州升都督府的时间，池田温指出《唐会要》的永徽二年为永泰二年（766年）之误，且敦煌文书中出现“沙州都督府印”最早者见于《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769年）手实》，认为《图经》是永泰

①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34—135页。

②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7页。

③ 仓修良、陈仰光：《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发展》，《文史》2001年第2期。

④ 《旧唐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本，第1640页。

⑤ 《旧唐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44页。

⑥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编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页。

⑦ 《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238页。

二年五月后更名《沙州都督府图经》^①。然而，从地区都督府更置的情况来看，我们以为史籍中关于沙州于永徽二年升都督府的记载与史实并不相悖。凉州总管府管区起初包括凉、甘、肃、瓜、鄯、兰、河、廓、会等九州^②。武德五年（622年）析出瓜、西沙、肃等三州，别建瓜州总管府，武德七年（624年）凉州总管府改称凉州都督府，同年，瓜州总管府亦改为都督府，武德八年（625年）撤销瓜府，另置肃州都督府，仍管三州，贞观元年（627年），罢肃府，贞元中复立瓜州都督府。^③在此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只有沙州永徽二年（651年）升都督府的记载，直到开元十五年（727年），史书中才再次出现了瓜州都督府的信息。是年吐蕃大举侵扰河西地区，“（萧）嵩又奏以建康军使河北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帅余众筑故城，板干栽立……朝廷喜其功，以瓜州为都督府，以守珪为都督”（《资治通鉴》卷213）。因此，艾冲提出从高宗永徽二年五月沙州升都督府，直到开元十五年（727年）都督府徙置瓜州后，沙州都督府才降为沙州。^④开元十五年再置瓜州都督府，是否如艾冲所说同时降沙州都督府为沙州，在史料中尚找不到根据。但须指出的是，凉州陷落后，河西节度使正是在永泰二年（766年）徙镇沙州，以敦煌为大本营，展开长达16年之久的抗击吐蕃的历史。^⑤因此很难说沙州会在永泰二年升都督府。

从以上分析大致可将《图经》的修纂时间框定在永徽二年（651年）到开元初。

从《图经》中出现的避讳信息，亦可对《图经》的下限时间略作考查。统计前辈们查出和我们重新检括出的避讳，有武避虎讳1次、其避基讳6次、隆字缺笔1次、人避民讳6次、代避世讳3次。

① 池田温：《沙州图经考略》，《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第34—35页；仁井田陞《ペリオ敦煌发见唐职员令の再吟味》，《石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1965年，第451—453页。

②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476页。

③ 《旧唐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42页。

④ 艾冲：《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⑤ 安家瑶：《唐永泰元年（765）—大历年（786）河西巡抚使判集（伯二九四二）研究》，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4页。史苇湘：《河西节度使覆灭的前夕——敦煌遗书（伯2942号残卷）的研究》，《敦煌研究》1988年创刊号。

晋孙毓《七庙讳字议》据礼提出：“天子诸侯皆讳群祖，亲尽庙迁，乃舍故而讳新。”^①隋文帝即位后，参酌南北朝旧制，自高祖以下置四亲庙，唐初也沿此制，至唐太宗建七庙，玄宗时增至九室。^②文书中的避讳从虎到隆基，不包括武则天在内恰好九代，与玄宗时所定礼制相符。与《图经》记事时间范围相当，故文书中的避讳当为当代人写作之避，即使是用来誊抄存档，或后人抄写实习，其抄写时间亦不应迟于开元天宝年间。

二、续修及相关问题

《图经》中除了有“今年”、出现最晚的“开元”年号等明确的纪年标志外，书写格式及年号名称、军事机构名称、驿路设置、人名具衔以及军事事件和文化史迹等也提供了断代的信息。

《图经》中出现的最晚纪年为“其年（开元四年）九月”。这说明，《图经》最晚在开元四年（716年）至六年（718年）间中补修过。

第180行：“又奉今年二月廿七日敕，第五道中总置十驿，拟供客使等食，付王孝杰并瓜州、沙州审更检问。”按《资治通鉴》卷205：武后天册万岁元年（695年）“秋七月辛酉，吐蕃寇临洮，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之”，次年“三月壬寅，王孝杰、娄师德与吐蕃将论钦陵赞婆战于素罗汗山，唐兵大败，孝杰坐免为庶人”。严耕望将“今年二月廿七日敕”指为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但查检年表，孝杰免官于三月壬寅，五日后方改元万岁通天元年，故实“今年”为万岁登封元年。^③《图经》原本的一次确切的修纂时间当在万岁通天元年三月到十二月之间。

有了武周万岁登封元年（696年）这个确定的坐标点，可知当时《图经》确曾例行修纂。《大唐六典》卷5《兵部》“职方郎中”条：

①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礼六十四》，中华书局，1988年，第2726页。

② 《新唐书·礼乐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30—340页。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64页。

③ 池田温：《沙州图经考略》，《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第72—73页。

“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版籍皆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省。”《唐会要》卷5“职方员外郎”：“建中元年（780年）十一月廿九日请，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复故。”此外，《新唐书·百官司志》、《五代会要·职方》、《续资治通鉴长编》、《乾道四明图经·序》中亦有类似记载。本卷修纂下限在开元初，应遵“三年一造”的律令。以万岁登封元年为一个确切的续修年份，再上下推出《图经》修编的其他年份，应该说比较合理。

卷中大周处多跳行、空格，且对发生在李唐的事件多在年号前冠一“唐”字，而武后至天授始改唐为周后所发生的事件前冠“周”字。如白龙条之“唐武德”，瑞石条之“唐乾封”，鱼泉驿条和白雀条之“唐咸亨”，双泉驿条之“唐仪凤”，木连理条之“唐调露”，悬泉驿和无穷驿条之“唐永淳”，黄龙条之“唐弘道”，甘露条之“唐垂拱”，歌谣条之“唐载初”，五色鸟、日扬光、蒲昌海五色、白狼诸条中之“周天授”等。国号之使用颇为严格，毫不混乱，将唐与周区别得十分清楚，反映出这部分内容写于武周的语感和情感特征。可见，武周时，《图经》确曾不断地按例修纂。

驿路设置中，稍竿道与第五道交替使用的时间，是推断图经修纂时间的又一参考坐标。双泉驿条：“唐仪凤三年（676年）十月，奉敕移稍竿道，就第五道莫贺延碛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奉，如意元年（692年）四月三日敕，移就稍竿道行。至证圣元年（695年）正月十四日敕为沙州遭贼，改第五道来往。”按照图经的修纂规则，本条内容至少有过两次增补。一次是如意元年奉敕改道后曾补修过，另一次是证圣元年奉敕改道后补修过。一十九所驿清泉驿中有“刺史李无亏以旧路石碛山险，迂曲近贼，奏请近北安置。奉天授二年五月十八日敕移就北。”而甘草驿条则为：“前刺史李无亏为中间路远，瘠有沙卤，奏请奉敕置。”两相对照，《图经》在李无亏就任沙州刺史和卸任后均有过修纂。东泉驿条亦标明李无亏奉天授二年敕移就北，这样，东泉驿和其后“奉前敕移废”的其头驿、悬泉驿、鱼泉驿等均与清泉驿条同时补入《图经》当中。

张芝墨池条下有“昭武校尉前行西州岸头府果毅都尉上柱国张怀